

《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

朱振武¹, 杨赫怡²¹

(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

2.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翻译的《长恨歌》秉承对“他者”再现的宗旨，成功展现了王安忆小说的精微与宏达，展现了上海文学的力与美。面对广大英语读者，两位汉学家对源语文本审读细致且拿捏精准，既不游离源语，又不机械愚忠。虽然偶见瑕疵与不足，但总体来说其异化的翻译策略巧妙地还原和重现了原作中的上海元素，其归化的移译办法达到了生动传神地讲述上海故事的文本旨归。异化与归化的完美结合和巧妙平衡，是《长恨歌》在英语世界站稳脚跟的堂奥，也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正确门径之一。

【关键词】《长恨歌》；白睿文；汉学家；上海元素；归异平衡

【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 (2017) 04-0081-12

作为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安忆出色地把握住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魂。的确，长期的上海生活以及女性独有的缜密心思，使她成功触摸到了上海文化的脉动，完成了上海书写的巅峰之作《长恨歌》。《长恨歌》以上海 40 年的历史变迁为时代背景，以绵密细致的笔触书写了一个弄堂平凡女子如梦的一生。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掀起了一股上海怀旧热，还荣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8）、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0）和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2001）等多种奖项，并很快引起了国外汉学界的注意。《长恨歌》的英译本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美籍菲律宾华裔陈毓贤（Susan Chan Egan）从 2000 年开始，历时 8 年共同完成，于 200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恨歌》进入 2011 年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项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决选名单，其英译者功不可没。这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入围这一世界文坛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奖。

就像白睿文在其英译本后记中评价的那样，《长恨歌》是“当代中国小说真正的经典”。^[1]⁴³⁹ 将一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时，为了达到同样的阅读效果，译者“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2] 然而，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同时又不错失原作传达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两种语言符号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中找到归化与异化间的平衡点。

¹ 收稿日期：2017-3-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WW003）

作者简介：朱振武（1963-），男，山东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文化及文学翻译方面的研究。

杨赫怡（1993-），男，云南昆明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异化：精准传递上海元素

中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面貌引起了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浓厚兴趣，而上海这座闻名遐迩、集中国元素和西方特质为一身的国际大都会更是人们的兴趣所在。实际上，中国文学目前在国际上尚未产生很大的影响，且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人数很少。^① 美国出版商 2012 年仅仅购买了 423 本外国书籍的翻译版权，约占美国书籍出版总数的 3%，在这 423 本外国图书中，只有 16 本是在中国出版的。^② 但是《长恨歌》的上海书写通过汉学家的译介，以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成功走入了英语读者的视野，掀起了英语世界的“上海热”。

王安忆通过《长恨歌》为读者勾勒出上海文化的图景，把一个五彩斑斓的十里洋场以及弄堂里的传奇故事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她的上海书写无疑会触动西方人的上海情结，但厚重笔墨描摹出的旧上海，能否原汁原味地进入英语世界？原作海派文化中上海传统的空间环境、老上海的遗物以及海派代表人物，如何翻译这些重要元素才能让异域文化的读者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新的好奇？怎样才能重新唤醒他们埋藏在心中的“海上繁华梦”？译者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文学作品要从本土走出去，并在其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在外语世界站稳脚跟，译者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恨歌》通过汉学家对文本的解读和翻译，以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进入到英语世界，获得了学者的一致好评。美国作家弗朗辛·普罗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书评《上海小姐》这样评价王安忆：“将一个小说家的艺术天赋发挥到了极致”，并把《长恨歌》定义为“杰作”。^[3] 英国学者米歇尔·霍克斯评价王安忆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4] 英语世界的评论家和读者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意味着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也意味着《长恨歌》作为上海文学的代表成功进入了英语世界。

《长恨歌》开篇并没有直切主题，而是用二十多页描绘了上海市井独树一帜的风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女子及其服饰，极力书写寻常巷陌间的细微差异，在浑然不觉之间让时光从字里行间溜走，让读者因时代的沧桑巨变而感慨。然而，这样的写法并没有受到英语读者的青睐。在白睿文和陈毓贤翻译完《长恨歌》之后，白睿文通过经纪人联系了二十多家美国的主流出版公司，却屡次碰壁。“每一家都看过王安忆的小说大纲，也看过前两个 chapters，就是没有一家明确表示要来出版。”^[5] 有人表示看不懂第一章对于弄堂和鸽子的描绘，有的则建议删掉。然而，弄堂作为上海传统的建筑，是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表，承载着城市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上海文化最有力的表现之一，也是世界了解上海、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流言体现了上海市民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带有流言特质的隐私性故事符合上海市民的欣赏口味。闺阁是中国少女的卧室，体现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女子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无奈境地，也暗示了小说主人公王琦瑶的悲剧命运。鸽子是盘旋于城市上空的“灵物”，它们站在城市的至高点上目睹着城市的沧海桑田。因此，这些独具上海特色和包含中国元素的叙述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面对阅读习惯迥然不同的英语读者时，译者最终还是选择了保留这些冗长的散文篇章，并对原作进行直译，也就是尽量采用异化译法。

异化翻译就是尽量贴合原文翻译，在句式、意象、修辞、典故、氛围、节奏和风格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长恨歌》中王安忆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女子及其服饰等上海特有的场景和元素的散文性描述对两位汉学家构成很大的挑战，但仔细比对原文和译文，我们发现两位汉学家让我们大喜过望。先看关于弄堂的翻译：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6]

①此论述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讲座《海派文化的源与流》的启发，提问环节时，张旭东教授与王安忆教授给出的回答让笔者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感谢。

②数据来源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美国加州大学张爱平教授的讲座《为何中国文学总在美国受冷遇？—美国 21 世纪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和出版》。

Looked down upon from the highest point in the city , Shanghai ' s longtang - her vast neighborhoods inside enclosed alleys - area magnificent sight . ^{[1]3}

弄堂是弥漫着浓郁上海韵味的标志性建筑，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江南传统民居的特色，也带着西方建筑浓郁的异域风情。^[7]在《长恨歌》中，弄堂孕育了王琦瑶的传奇故事。她生于弄堂，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之后又回到了弄堂，最后，在弄堂里结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弄堂里的流言、闺阁以及盘旋在弄堂上空的鸽子，都营造出《长恨歌》这个故事凄婉的氛围。因此，译者在英译本中忠实重现对弄堂的散文性叙述，决定了整部作品译介的成败。

“忠实又传神的译文有时甚至比原文更容易激发本国读者的审美感受。”^{[8]214}在处理弄堂这个上海传统民居时，译者并没有根据自己的理解，牵强附会地翻译这个对于英语世界而言完全陌生的空间环境，而是采用了异化的策略，直接用汉语拼音将弄堂处理为 longtang，并加以解释说明。这样既为读者引人了一个崭新的文化信息，又跨越了阅读理解的障碍，也显示了译者深思熟虑的翻译过程和对上海文化的精心研究。“vast”体现了弄堂建筑群的庞大，弄堂是殖民时期为躲避战乱的人员兴建的临时住所演变而来的，这种中外杂居的居住特点，给弄堂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enclosed”表明弄堂居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外部世界的变迁并不挂心。小说中的王琦瑶与严家师母、毛毛娘舅以及萨沙等人的围炉夜话和各种聚会，都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

再看对流言的翻译：

流言其实都是沉底的东西 … … 是做人的一点韧，打断骨头连着筋，打碎牙齿咽下肚，死皮赖脸的那点韧。^{[6]9}

Gossip always sinks to the lowest place … It has the tenacity for holding onto life that keeps the muscles intact when the bones are shattered , that enables one to swallow the teeth broken in one ' s mouth - a brazen-faced tenacity . ^{[1]10}

世俗的上海文化使王安忆的上海书写都带有一丝“流言”的特质，它将里弄的隐私性故事精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非常符合上海市民的欣赏口味。译者抓住了“流言”的内核，既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精髓，又形象生动地把原作所传达的信息带入译语文化中。对于原文中表现出的“打断骨头连着筋，打碎牙齿咽下肚”的那点韧性，译者采取了异化的策略，直译为“keeps the muscles intact when the bones are shattered, enables one to swallow the teeth broken in one ' s mouth”，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让英语世界读者体验中国俗语带来的无穷魅力和生动趣味，这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闺阁的翻译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6]15}

The young lady ' s bedchamber embodies the naivete of the shanghai longtang, passing in a single night ' s time from being young and innocent to being worldly and wise , in a never- ending cycle, one generation after another. ^{[1]18}

闺阁见证了弄堂女子从稚嫩走向成熟，从不谙世事到世故老练的过程，它是温存美丽且知冷知热的，是上海弄堂里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译者对这句话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从而重现了旧上海女性在闺阁中的成长历程，把时代带给闺阁必然又无奈的结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翻译作品中与鸽子有关的语句时，译者几乎到了“愚忠”的程度，但这种不译之译倒是更为准确传神。

它们是惟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有谁看这城市有它们看得清晰和真切呢？^{[6]15}

They are the only living beings that can look down upon this city. Who can observe this city mor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than they ?^{[1]18}

鸽子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灵，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变化，目睹了发生在人们身上的故事。译者在对鸽子的翻译上，并没有改动原文所要传达的信息，而是还原了后半句作者的反问：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法做到像鸽子那样自由地盘旋于城市上空，也看不清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眼界自然也是狭隘的，只有它们才可以将这城市看得真切。

译者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的还原体现了原作者的上海情结，而译者通过对原作细致的解读和传神的翻译也将上海这座城市精髓推介到了英语世界中。敏锐的文化视角以及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使译者能够深入地了解王安忆的创作意图。白睿文和陈毓贤在翻译《长恨歌》的过程中，竭力领悟原作者的匠心，努力做到尊重且忠实于原著，把翻译做成了“翻异”。^⑩“要想使外国的、异域的或异己的东西，变成‘我’的或‘我’可以把握的，就必然将这一对象设置出来，然后把它拉近，再拉近。^[9]

作为表现城市文化和时代风景的城市文学，离不开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人性是世界文学中永恒的话题，“人是文学的灵魂”，^[10]也是文学价值的体现。如果没有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对复杂人性淋漓尽致的书写，那么都市便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美国文化评论家李欧梵在评价《长恨歌》时说：“王安忆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来说，仍是非常罕见的。”^{[11]226}王安忆通过叙述平常的事件描绘了一个女子悲剧的一生和一座城市40年的兴衰沉浮，她极力把对上海所有的理解与感悟融进文字中，将极其细微的日常生活写成一部具有恢弘气势的上海史诗。这部小说以独特的文化视角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开启了一扇了解上海、了解中国的大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西方人早已萌动的“上海梦”。

《长恨歌》的核心人物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女子。译者深知这个人物的分量，在翻译与之相关的对话、描写的语句时更加贴近原文，一丝不苟，基本上仍是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王琦瑶说：这我倒有不同的看法，竞选“上海小姐”恰巧是女性解放的标志……听了这话，王琦瑶却变了脸，冷笑说：我倒不这么想 … …^{[6]54}

“Well , I have a different opinion about that , ” Wang Qiyao rejoined . “As far as I’m concerned , competing in the pageant is the very symbol of a woman’s liberation … … ”

Hearing these words , Wang Qiyao’s expression changed . She continued with a cold smile .

“Well , that’s not how I see things … ”^{[1]67}

王安忆通过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直接表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通过勾勒王琦瑶的故事，折射出女性与城市的关系。因此，译者若无法完好无损地重现王琦瑶身上所散发的上海韵味，就无法重现小说的海派特质。这一段话生动地体现了旧上海女性正在觉醒的自我意识以及她们对传统礼教的抗争和对解放的呼唤和呐喊。在上海这座城市中长大的女性散发着上海城市文化所特有的品质：时尚浪漫，引领潮流，百折不挠，标新立异，独立自主，不受传统礼教束缚。译文重现了王琦瑶对导演正辞严的反击，如“王琦瑶说”的“说”字，译者处理为“rejoined”，意为反驳，突出了王琦瑶与导演相背离的看法。

①“翻异”为蔡新乐著作《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中提到的观点。

再如王琦瑶话语中的“ Well”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和“ that’s not how I See things” , 既体现了王琦瑶思维缜密, 也表现出上海女性在面对男性权威时临危不惧和百折不挠的风采。

此外, 服饰对上海人的重要性是人尽皆知的, 两位汉学家对服饰词汇的翻译同样是下足了功夫。

一件素色的旗袍。^{[6]136}

a Simple cheongsam .^{[1]162}

一件蓝哔叽人民装。^{[6]149}

a well - pressed blue khaki “ liberation suit ” .^{[1]177}

她本想穿旗袍, 外罩秋大衣, 又觉得过于隆重了 …… 所以就穿上了薄呢西裤, 上面是毛葛面的夹袄, 都是浅灰的, 只在颈上系一条花绸围巾, 很收敛的花色。^{[6]160}

She had planned on wearing a light coat over a cheongsam , but then thought this might be too formal … Instead , she put on a gray jacket with a poplin facing over a pair of matching wool pants ; a subdued floral silk scarf completed the outfit .^{[1]190}

“衣服至少是女人的文凭”,^{[6]290} 对于上海女性来说, 衣服是做人的面子, 是支撑起女人整个局面的关键, 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所在。旧上海的服饰是值得研究的,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上海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相结合的缩影。对于服饰的翻译, 译者只有采取直译的策略, 才能让英语读者获得原汁原味的感受。服饰的潮流并不是由多个时尚元素简单堆砌起来的, 它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的, 体现了上海人的穿衣智慧以及他们追求创新的卓越品质。所以, 从颜色、面料到式样的选择, 都体现了上海女性对时尚敏锐的洞察力。译者没有放过任何一种服饰元素, 让读者在字里行间领悟到了上海女性对于时尚的追求。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 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也在慢慢提高。上海这座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国际大都市, 除了与国外进行政治经济的交流沟通外, 其海派文化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青睐。霍克斯在《长恨歌》英译本的书评中提到: “这部小说的‘实验性’恰恰在于它设法违背‘可读性原则’, 使阅读变得十分费力 …… 我可以大胆地说, 这些尝试都会让翻译变得十分有趣, 并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来说是一个灿烂的前景。”^{[4]1}《长恨歌》的上海书写将其中的上海元素与王安忆小说创作艺术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小说丰盈的意象, 长长的段落, 让人捉摸不透的句子, 没有引号作为提示的人物对话, 给翻译造成了很大难度。两位汉学家经过恰当巧妙的处理, 将小说中的海派文化以及颇具文学价值的上海元素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英语读者, “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语气语调乃至节奏韵律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12]7} 给读者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双重享受。虽然译文中仍然有两种文化负载的信息不平衡的现象, 但总体上看, 《长恨歌》译介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二、归化: 生动讲述上海故事

归化翻译指的是尽量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很大程度取决于译本的可读性, 也就是说, 译者应该基本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

当白睿文拿着《长恨歌》英译本去与多家美国的出版机构商谈时, 有的出版社为了获得更好的销路, 建议把小说的名字改成“上海女儿”“上海小姐”“上海沧桑”之类含有“上海”的标题, 作为吸引读者的噱头。白睿文拒绝了出版社为销售目的擅改原作的做法, 坚持将书名确定为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 并特意加上副标题 A Novel of Shanghai 。英译

本的副标题表明了小说的城市主题，也缓解了英语世界读者看到标题时茫然、疏离的阅读心理，同时也表明了原作者将一座城市命运与一个里弄平凡女子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写作意图。霍克斯在评价《长恨歌》英译本时曾说道：“副标题的添加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很多方面，这部小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教科书式的‘都市文学’。”^[4]此外，他还分析了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与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之间的互文关系。王琦瑶与杨贵妃之死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下被勒杀窒息而死，这也体现了王安忆将小说命名为《长恨歌》的用意。王琦瑶的死暗示了“动乱的结束，秩序的回归”^[4]她的死也将成为“漂浮在上海里弄间的又一则流言”。^{[1]499}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小说将叙事的中心设定在上海，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带着读者去感悟历史的变迁，去思考和挖掘城市的精神，然而闭塞的弄堂文化使小说中的人们大多沉浸在怀旧的状态，并游离于历史之外。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一颗经得起世事巨变的“上海心”。因此副标题的选择不仅跨越了两种文化间的藩篱，也在怀旧的热潮中勾起英语读者对上海的好奇心。

王德威曾撰文这样评价王安忆的写作风格：“王安忆的叙事方式绵密饱满，兼容并蓄，其极致处，可以形成重重叠叠的文字障—但也可以形成不可错过文字的奇观。”^[13]这也正说明了《长恨歌》译介的难度以及面临的挑战。然而，由于蕴藏着丰富的上海元素和巨大的文学宝藏，这部小说进入英语世界时，受到了读者的青睐。《长恨歌》一改传统小说的叙事风格，将人物对话由“他说”或“她说”这样的直接引语用一种抽象化的叙事手法表达出来，直接用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去传达人物的个性和环境的变化。阅读《长恨歌》这样的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体验，更何况是阅读习惯迥异的英语读者。白睿文在“译者说明”和“致谢”部分指出，为了保证英语世界的可读性，他将原作中篇幅较长和行云流水般的句子作了调整，并将使用第一人称的对话添加了引号并细分了段落，其他使用第三人称的对话则沿用原作的形式，将其融入较长的篇幅中去。除此之外，译者还用了汉语中少见的斜体，用以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14]其实，译者对于原作的归化与变通并不局限于作者的写作风格，而是贯穿在译本的字里行间，但这种归化并不显得突兀牵强，而是把文本深层的意蕴译得更精准到位。

就说那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做的是夫妻的样子，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不几日就有打上门来的，碎玻璃碎碗一片响。^{[6]12}

Take , for instance , the couple in the living room across the way : who can say for sure that they are husband and wife ? They may very well be pair of illicit lovers on the brink of discovery; a few days later , a knock comes at the door , and all the neighbors will hear the sound shattering glass and furniture being broken .^{[1]13}

弄堂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特有的民居形式，是老上海人生活和娱乐的场所。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历经着岁月的洗礼，在弄堂的一砖一瓦上刻下或深或浅的烙印，成为了近代上海的一部分。此外，弄堂这种五方杂处的居住形式，也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多元开放的特点，使人们敢于尝试有违纲常伦理的生活方式。海派文化不同于中国传统中的“厚人伦，美教化”，^[14]它毫不掩饰人性本能欲望的宣泄。《长恨歌》把都市描绘得如同万花筒一般，充满了变化万千的景象和各种各样的欲望，为里弄的人们增添了强烈的感官刺激。这一段生动地描绘了生活在暗处的妍居男女，“做的是夫妻的样子”，实际上可能并非合法夫妻。译者用反问的语气将作者这一含蓄的怀疑态度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同时，译者将“狗男女”译作“pair of illicit lovers on the brink of discovery”，填补了译语文化的空白，搭建起了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

繁殖的方式也很多样，有时环扣环，有时套连套，有时谜中谜，有时案中案。^{[6]10}

Their method of reproduction are also varied : sometimes linear , like a chain of interlocking rings , at other times concentric , like a suite of riddles.^{[1]11}

①此处参照《长恨歌》英译本正文前的“Translator’s Note and Acknowledgements”部分。

“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15]这一段描绘的是流言的传播方式，作者用“繁殖”一词形容流言的传播速度之快和种类之多。原文利用汉语独特的主宾同形结构和排比罗列了多种流言的“繁殖”方式，在译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翻译，但是译者摆脱了源语文化的束缚，在翻译之前分析了这几种方式，归纳出两种流言的“繁殖”方式：线性的和同心圆的，最后将其译为“ Sometimes linear , like a chain of interlocking rings , at other times concentric , like a suite of riddles ”。这样先阐明方式，再用比喻加以说明，既保留了原文传达的信息，又让作品进入到英语世界后具备一定的可读性。

《长恨歌》第二部分有一段毛毛娘舅为王琦瑶算命的情节，译者在没有削减或更改原文的情况下巧妙地规避了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存在一定不可译性的难题。如下：

要我给，我偏给个“地”字 … … 也用筷头蘸了汁水写了个“地”，然后从中一分，在“也”字左边加个“人”字旁，说：是个“他”，也是个贵夫。^{[6]150}

“ … If I have to give my own character , it would be di , or 'earth . ”

Then he broke the character down into its components , inscribing its right side 也 on the table , before adding the radical for " man " beside it , thereby producing the character for " he " 他 .

“ It ' s a 'he' ! ” he exclaimed , “ which also means that you will have a wealthy husband . ” ^{[1]178}

在翻译这段对话时，译者并没有对汉字进行注解，而是采用斜体拼音的形式，直译后再添加上汉字。他们大胆地再现汉字拆解重组过程中其意义的转换和重建，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成功地移植到了英语世界中。

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历史，却也有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的。^{[6]6}

These rumors may not necessarily qualify as history , but they carry with them the shadows of time . There is order in their progression , which follows the law of Preordained consequences . ^{[1]7}

这句话虽短，却体现了译者深思熟虑的翻译过程。译者将“有着时间的形态”翻译为“ carry with them the shadow of time ”，而非直译为“ have the forms of time ”，巧妙地体现了“流言与时间如影随形”的特征。“循序渐进有因有果”被译者染上了一层佛教的色彩，故翻译为“ there is order in their progression , which follows the law of preordained consequences ”，借此体现佛家的“因果轮回”。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译者并没有字随句摹，亦步亦趋，而是挖掘句子的深层含义，不削减原意又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

爱丽丝公寓是在闹中取静的一角，没有多少人知道它。^{[6]88}

Alice apartments is a place unknown to most , a quiet island in the midst of a noisy city. ^{[1]111}

这句话仅用“ island ”一词便将爱丽丝公寓的“无人问津”表现得惟妙惟肖：地点处于闹市，却又鲜为人知，像极了一座孤岛。译者在深入理解原文之后，结合译语文化，巧妙传达了源语文化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搭建起了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

墙是隔音的墙，鸡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6]4}

The walls are soundproof so that people living even in close quarters cannot hear one another, and the buildings are widely spaced so that neighbors can avoid one another.^{[1]5}

译者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机械地照搬原文，字字对应，而是巧妙地规避了“鸡犬”“老死”等容易让读者产生与原文不相关联想的词句，用对应的英文将中国谚语灵活地表现出来，自然流畅地传达了“互不相闻”与“彼此不相往来”的意旨。

《长恨歌》的文学风格与语言特质以及它呈现的传统文化、上海文化和西洋文化，与英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差异巨大，这就将译者置于异质性与可读性的较量中。倘若译者一味地求异，始终牵强地去翻译一些不可译的文化意象，就会破坏文本的阅读美感，使其不被读者所接受。《长恨歌》的译者在突显异质文化的同时，不忘因地制宜，灵活把握，机智应对，对迥异的文化信息进行处理，从而达到了良好的阅读效果。

三、异化为忠，归化为通，未失“本我”实乃理想境界

“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的基本信息，还要传达文学作品所特有的审美信息。”^[16]《长恨歌》英译本进入到英语世界时，尽管充满陌生的文化意象和异国元素，但依旧让读者在直指人心的小说世界中领悟城市文学中的欲望、道德、人性以及伦理，体验小说带给人们的审美价值。王安忆通过上海的女性直接表现城市的气氛、思想和精神，并将主人公王琦瑶置于庞大的空间架构和历史进程中，工笔绘制了一幅城市生活图景，风格纪实，文笔绵密精致。面对作者和原语文本，两位译者始终秉承着忠实的态度，尽可能地贴近作者的文学思路和写作风格。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译者又做出适度的变通，用读者熟悉的方式呈现原作陌生的文化意象，使英语读者不仅能了解他们并不熟悉的上海特色和中国文化，也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感受了中国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力与美。

文学翻译本身就是在原作与译作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原本隔着千沟万壑的两种语言在不断地斗争与对抗中进行交流融合。在艰难的翻译进程中，原作信息一定程度的减损是不可避免的，但译者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既要保存原作的风味，又要不因文化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这样做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愚忠，避免机械对等，在通透把握和理解全文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和谐的语言空间，陈述原文的意义，让原文所表达的内容和字句之后的含蕴在新的表达空间中获得自身的生命”。^[17]白睿文和陈毓贤在翻译《长恨歌》时，一方面从原著出发，始终坚持忠实原文的态度，以保留原著的气质神韵，将地道的上海文化中的诸种元素与王安忆的语言特色移植到英语世界中去；另一方面，原著中出现的具有强大异质性的文化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兴趣，译者又不得不对其进行适度的改变，减少读者阅读和理解的困难。这种异化与归化的完美结合，向英语读者展示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景象，让其用一种本土化的方式去体验异质文化，使两种文化在“他者”与“自我”的冲撞和交融中迸发出灿烂的火花。

作为一部语言丰富细腻、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文学作品，《长恨歌》蕴含着丰厚的审美信息，这需要读者较深的文学素养，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也不例外。白睿文和陈毓贤两位汉学家中文功底扎实，文学涵养深厚，对中国文学有着饱满的研究热情，再加上对英语世界的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了如指掌，能够更好更准确地把握读者的审美情趣。同时，两人能够较为及时地与译语国的出版社、大众媒体、学术界、赞助商进行沟通，最大限度地传播和发扬中国文化。在翻译《长恨歌》的时候，白睿文、陈毓贤始终保持着尊重原作的态度，尽可能地还原和重现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形象，推敲其语言艺术，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力求以最小的损失还原作品的全貌，也给目标语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在一次访谈中，白睿文坦言：“作为译者，我觉得我的责任不是去改变它原来的面貌，而是尽量使得它原来的面貌在英美读者面前出现。”^[18]为了能够将上海原原本本地重现在英语世界读者的面前，白睿文多次走访上海，亲自体验上海这座摩登都市的人文风情和城市精神，感受弄堂里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体味城市的变迁以及社会的变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在翻译《长恨歌》前，他不仅研究了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和写作风格，还细致地了解了根据《长恨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尽管他对这些文学衍生品持一定的赞赏态度，但他还是指出：“这些根据小说

改编的影视作品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为了增加戏剧效果和故事的连贯性，不断对人物进行发挥和创造。”^{[1]439} 这些都表明了白睿文对原作忠实、尊重的翻译态度，也暗含了译者对原语文本文学价值的肯定。另外，两人通过对当代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进行甄别遴选，最终敲定《长恨歌》为其翻译项目，其意图之一就是校正一些仍对上海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有误解或歪曲的读者的价值观，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缩短中国文化作为他者的形象和译者本国的文化形象之间的距离。

长期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掌控和后殖民的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化进程始终步履维艰。西方有些读者认为中国文学仍停留在从前那种枯燥乏味的政治说教阶段，认为中国文学就是一种毫无文学价值可言的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现状的简单的资料。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在一篇名为“Great Leap Forward”的文章中提到西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就是为政治打广告，是进行政治说教的素材。”^[19]《长恨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固有成见，它摒弃了宏观的政治书写，也规避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描摹沪上的灯红酒绿与纸醉金迷，而是将目光投向寻常巷陌，把宏观的历史变迁与政治动荡作为书写故事的背景。时局的巨变体现在对寻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列宁装取代西服，华美尊贵的旗袍逐渐绝迹，如同城市心跳声的有轨电车叮当作响的声音也消失在了历史的变迁中。李主任飞机失事，程先生跳楼自杀，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无情地将一个时代画上了句点。因此，当《长恨歌》英译本进入到英语世界中时，尽管有令读者觉得晦涩难懂，的异质性的意象，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达到两种文化的交流。《长恨歌》散文化的写作手法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浓浓的诗化美，但要将这种冗长杂沓的表述以一种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外语表达出来时，无疑会给译者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和翻译难度。虽然译者在翻译一些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诗句或文化意象时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译者将众多崭新的外来形象经过还原和重现，使其完整地进入到英语世界中，这仍是文学译介的一大成功。

“译文不仅应该用读者熟悉形象去调动读者的联想，译文还应该给读者介绍其原先不熟悉的外来形象。”^{[8]188}可以说，《长恨歌》的两位译者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说道：“《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11]154}《长恨歌》出现了多处饱含浓郁中国文化色彩的描述，再加上作者本人的语言和叙事风格，这种极致的写作状态赋予了《长恨歌》浓郁的中国风情，为文化的交流设下了重重屏障。译者对原作不到位的理解和随意改动，会使其独具一格的上海元素和中国特色丧失原本的面目。白睿文和陈毓贤两位汉学家在不懈的努力下做到了“既能进入到原作的审美视角和原作者所臆造的想象空间，又能充分考虑到译人语读者的接受视角”，^{[12]7}并找到了恰当的对应词和表达办法。在接受采访时，白睿文曾说：^[18]

我希望我扮演的是一个透明人的角色。通过我，原作可以在英语环境中开口说话，来表达原作的精神世界。我的翻译目的就是希望自己译得好。如果在译本中我带有个人的风格，那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译者。这才是译者应有的操守。不是削足适履，曲意逢迎，而是尽可能地还原原作，保留原作的异质性、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实现文学译介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 [1] Wang Anyi.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 A Novel of Shanghai[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 [2] 谢天振. 翻译研究新视野[M].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3 : 63 .
- [3] Francine Prose . Miss Shanghai[N]. The New York Times , 2008-05-04 (9)

-
- [4] Michael Hockx .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 A Novel of Shanghai [J / OL]. (2009-10-1) [20 16-12-10]. <http://U.OSU.edu/mc/c/book-reviews/song-of-everlasting-sorrow/>
- [5] 季进. 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 — 王德威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8 (5) : 68-78 .
- [6] 王安忆. 长恨歌[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
- [7] 张鸿声. 上海文学地图[M]. 上海: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2 : 5 .
- [8]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 [9] 蔡新乐.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208 .
- [10] 华霄颖. 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 — 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 15 .
- [11] 王安忆. 王安忆说[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
- [12] 朱振武. 翻译活动要有文化自觉[N]. 文艺报, 2015-12-16 (7)
- [13] 王德威. 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 读书, 1996 (6) : 3743 .
- [14] 许道明. 海派文学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 46 .
- [15] 钧. 从翻译出发 — 翻译与翻译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55 .
- [16] 谢天振. 海上译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94.
- [17]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184 .
- [18] 吴贊. 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 — 白睿文访谈录[J]. 南方文坛, 2014 (6) : 48-53 .